



【短史记】

褪去罗曼蒂克和绅士精神的泰坦尼克号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宋锐

秩序井然的救援,妇孺优先的原则,凄美的爱情故事,是人们对于100多年前的泰坦尼克号船难的印象。4月16日,纪录片《六人——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》上映,它为观众从深海中重新打捞起了一段被人刻意隐瞒的历史,在虚构爱情和绅士风度的背后,电影中引入泪下的求生场景来源于一名幸存的中国人,历史上竟还有六名中国人在船难中死里逃生。他们是如何幸存下来的?后来的命运如何?

纪录片《六人》动员了20位研究者历经1825天的找寻,走访海内外20多个城市,翻阅上千份史料,探访上百位联系人及受访者,一段华人漂泊异国的辛酸经历终得以与世人相遇。这部追寻中国人在泰坦尼克号船难中遭遇的纪录片,由詹姆斯·卡梅隆监制。在此之前,2012年卡梅隆导演的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发布3D重制版时,一段曾经删减的视频在网上走红。视频片段中,除了女主角露丝,14号救生船还救起了一名趴在木板上、说粤语的中国人,这名中国人就是Fang Lang。关于船难的记录,他留下了一首诗:“天高海阔浪波波,一根棍子救生我。兄弟一起有几个,抹干眼泪笑呵呵。”

在3D重制版《泰坦尼克号》中,关于中国幸存者Fang Lang的删减镜头得以恢复,在长久的沉默背后,是一段掩埋了100多年,关于中国移民劳工的真实历史。1912年4月10日上午,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从英国的南安普顿起航,准备开往美国纽约,港口人群攒动。方荣山手握编号1601、价值56英镑9先令11便士的三等舱船票,与另外七名男性同伴一起走上舷梯。

他们都来自中国香港,年龄在24岁-37岁之间,是英国唐纳德轮船公司雇佣的锅炉工,公司给买了“团体票”才得以登上这艘“世界工业史上的奇迹”,作为两千多名乘客中的八人,他们原定搭乘泰坦尼克号到达纽约之后,到经停纽约的阿那特号(Annetta)上做工。Fang Lang的计划则是去美国俄亥俄州做生意,以便尽快摆脱自己的劳工身份。泰坦尼克号向北大西洋驶去,Fang Lang一行八人在位于巨轮下层甲板的三等舱落脚,挤在一间客房里,日常工作是最苦最累的烧锅炉。泰坦尼克号有当时最先进的发动机系统。它有三台主发动机,需要29台锅炉产生的蒸汽驱动。为保持蒸汽发动机运行,需要工人每天将煤徒手铲进燃煤炉内。

这八名中国人乘坐泰坦尼克号是为了养家糊口,心中怀揣着以后的人生规划,没想到却遇上了航海史上的一场大灾难。

1912年4月14日晚上11点40分,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海域突然与冰山相撞,仅仅过了2个小时40分钟,这艘被称为“永不沉没的巨轮”就沉没于北大西洋海底,1500多名乘客葬身冰冷的大海,幸存的700多名乘客在海中挣扎了四五个小时,才等到前来救援的卡帕西亚号。

Fang Lang是泰坦尼克号乘客中,最后一位被救起的人。在船沉没过程中他用一具浮尸的皮带,将自己绑在一块木板上,凭着顽强意志力,挺到折返的救生艇赶到。这个情节,正是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剧本创作中,杰克把露丝托上甲板使其获救的重要灵感。

“当时我们都以为他死了。”救生艇上的乘客夏洛特·科列说:“我们朝他大喊,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”

当救生艇指挥官罗威与乘客们把Fang Lang拖上船后,五分钟内他就恢复

了体力。当发现身边的船员因劳累过度快要晕倒时,Fang Lang居然接过船桨划起船来。指挥官罗威说:“他看起来像个英雄!”这场船难中,包括Fang Lang在内的六名中国人都活了下来,余下两人落入海中,与船上另外1500多人一起葬身大海,遗体也没有被找到。在他的同伴里,Choong Foo爬上了13号救生艇,而关于Lee Bing,Chang Chip,Ling Hee,Ali Lam四人的获救,则出现了磨灭事实的说法。

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,把他们扭曲为“为了得救装扮成女人”“藏在救生船中的懦夫”,说他们躲在救生艇的座位底下,才捡回了一条命,根据泰坦尼克号的制造商——英国白星航运公司的主席J·布鲁斯·伊斯梅的说法,他与四名中国人同处在C号救生艇上,尘埃落定之后,他们才发现四名中国人躲在船底。

不过,纪录片《六人-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》在调查拍摄中,以1:1的比例还原了C号救生艇,在核实了记录上所有的人员之后,他们证实了根本不可能存在“藏了四人且没被发现”的情况。

但在百年来的历史中,这六位幸存者一直以“卑劣逃生者”的形象出现:他们抢占妇孺座位,偷躲偷藏。在船难过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,他们甚至以卑劣的负面形象走进了教科书,随后又被审判为“铁达尼上的国耻”(《西风》第二期,1936年10月1日)。

救援船只卡帕西亚号到达纽约港后,泰坦尼克号上的700多名幸存者陆续上岸。政府、公益组织、幸存者亲友等,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场援助,铁路公司也为生还者开辟专用的车厢,载他们前往下一站目的地,当时所有白人幸存者在美国都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。但六位中国幸存者却没有上岸进入纽约,他们无法踏上美国的土地,而是继续被送往其他地方做苦工。

为什么唯独中国幸存者会受到各种诽谤和污蔑,而且踏不进美国的土地?这还得从20世纪初美国的“排华法案”讲起。

在美国“排华法案”的海报上,画着一个代表美国的“山姆大叔”,他一手拿着一纸公文“排华法案”,一边脚踹在一个华人的屁股上。海报中华人的形象面容狰狞,身材矮小,还拖着一根长辫子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部美国在1882-1943年实行的“排华法案”,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明确排斥一个种族群体的法律。

六位中国幸存者的不公遭遇,正是因为这部臭名昭著的“排华法案”,纪录片《六人》的监制詹姆斯·卡梅隆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,“他们六人被洗刷、被隐藏、被删除,当时的美国不再向中国人开放,这种排斥只针对中国人,只有这些被长期利用的中国廉价劳动力要被驱逐出去。”抨击了美国当时对中国的歧视。

纪录片《六人》客观中立地道出了当年六位中国幸存者的遭遇,拍摄团队造访了中国的北京、香港,英国伦敦、南安普顿、布里斯多、利物浦,美国旧金山等20多个城市,卡梅隆更是对这部纪录电影提供了莫大的无偿帮助。可以说,纪录片《六人》是首次披露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乘客故事的伟大记录。

谈及拍摄这部纪录电影的主要原因,《六人》首席研究员施万克说:“其他的700多个幸存者都有后代很骄傲地讲他们的故事,唯独这六个中国人没有后代提起过他们的故事,这六位中国幸存者展现了勇气和智慧,他们理应和其他幸存者一样被记录、被流传。”



【人物志】

百岁许渊冲：既是才子又是『痴人』

□云韶

人们常说,做事要持之以恒。但是能够做到此的人,并不算多。毕竟,我们身边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。越是这样,越能体现出“痴”的可贵。

许渊冲,就是这样一个“痴人”。

自从看到许渊冲先生百岁生日的报道后,我便对许渊冲产生了兴趣,开始研读许渊冲的生平,了解许渊冲的成就,没想到许渊冲的一生,正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“痴”。

许渊冲,1921年出生于江西南昌,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,1944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,1983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。他从事文学翻译长达六十多年,译作涵盖中、英、法等语种,翻译集中在中国古诗英译,形成韵体译诗的方法与理论,被誉为“诗译英法唯一人”。这个称号,足见许渊冲在翻译界中的地位。

许渊冲虽然贵为翻译界的泰斗,但在求学初期,他对外语并没有什么兴趣。在他的日记里,许渊冲称自己小时候学英语的感受是恼火,不明白为什么daughter意味着女儿,pupil意味着学生,也记不住26个字母发音,要在WXYZ后面写上汉字“打破了油”“吓个要死”“歪”“嘴”才能背下来。后来他学过俄语、法语,试图学过德语,每种外语都学得很艰辛,刚学俄语时为有32个字母而生气,但他还是克服困难全记下来,几乎每次俄语考试都是第一。

渐渐地,学外语成为了许渊冲摆脱自卑的方法。在日记里,他形容自己小时候非常自卑,母亲早逝,父亲严厉,哥哥总挑毛病,唯一疼爱过他的长辈很早去世了,这些经历让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弱者,处处不如人,那时候日记里抄录的句子,是鲁迅文章里让他共鸣的四面都是敌人。他觉得自己因为平庸所以孤立,直到发现学习外语能出众,才开始培养出自信。

许渊冲首次翻译文学作品,是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期。他在联大读一年级的時候,就把林徽因的诗《别丢掉》译成英文。不过,许渊冲之所以翻译这首诗,主要还是为了解决个人问题——当时暗恋同班女生,他译出了这首诗,放到女生宿舍信箱里。

许渊冲对“三民主义”的翻译,让翻译界第一次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。许渊冲在联大读大三时,陈纳德上校率领美国志愿空军第一大队,来到昆明援助中国抗日。许渊冲和许多男同学一起报名服役,为美国空军担任翻译。在欢迎陈纳德的招待会上,翻译不知道该如何翻译“三民主义”一词,许渊冲当即站起来翻译道:“of the people, by the people, for the people(民有,民治,民享)”。这句话不是许渊冲的原创,它出自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的一段话,其含义与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“三民主义”类似。许渊冲巧妙地借此来解释“三民主义”,彰显了意译之巧妙。

1948年,许渊冲到巴黎大学留学,得以精通法语,深入研究法国文学。其间留法学生组团去罗马,受到教皇接见,学生中只有他懂得意大利语,于是由他代表留学生讲话,可见他在语言方面的造诣之深。1951年,留学生涯结束后,许渊冲回国担任了外语教授,开启了他一生翻译经典著作的伟大事业。

但凡“痴”人,多少都有点“狂”气。许渊冲也是如此。他性格豪放,心直口快而胸无城府。他与同行们争论直译好还是意译好,被指着鼻子骂过,被写文章批评过。他自然不甘示弱,用同样犀利的笔触,反驳回去,一度令一位翻译名家大动肝火,表示再也不会给许渊冲发表过论战文章的刊物投稿刊文。

对此,许渊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,“你翻得不如我,就不能反对我。要是说我的不对,你翻一个更好的出来啊?”

从1956年开始许渊冲出版译作,自此六十多载笔耕不辍,许渊冲已经出版了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李白诗选》《西厢记》《一切为了爱情》《包法利夫人》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等中英法三国文字互译的近百本文学作品。

在所有的翻译作品中,许渊冲对于唐诗宋词的翻译尤为呕心沥血。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思考,他为了把古典诗词完美地翻译给外国读者,独创了一套翻译标准三美理论:“意美、音美、形美。”

许渊冲曾经这样解释他的翻译理论:“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却要求优化,传情而又达意。我评论文学翻译标准是:一要达意,二要传情,三要感动。正如孔子说的,‘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’知之就是理解,达意;好之就是喜欢,传情;乐之,就是愉快,感动。形似而意似的翻译能使人知之,传达意美才能使人好之,传达三美(意美、音美、形美)更能使人乐之。”

毛泽东主席的诗句“中华儿女多奇志,不爱红装爱武装”,许渊冲大胆落墨,将“不爱红装爱武装”译为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。他指出powder有二义:一为涂抹脂粉,乃动词;二为硝烟火药,系名词。face亦有二义:一曰面对,乃动词;二曰脸孔,系名词。显而易见,许渊冲的译文内涵是“宁愿面临弹雨枪林,不肯对镜抹白涂红”,堪称与毛主席原诗的本意分外相近。

不过,即便如此,许渊冲的“三美理论”,还是在业界引发了不少争议,其中最著名的便是《红与黑》的论战。1995,许渊冲翻译了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。没想到这本书,竟然引来了不少翻译名家的口诛笔伐。法国文学翻译家施康强读了许渊冲译的《红与黑》后,写文章指出,译本中加入了原作者没写的内容,比如在本意粗活的词后面加上非常艰苦,全书最后一句,原话是Elle mourut,字面义为她死了。在许渊冲的版本中,这句话译为魂归离恨天等。这样的翻译,已经背离了司汤达的本意。此外,对于许渊冲的译本,读者也不买账。1995年,《文汇报》收集了市面上十几种《红与黑》的译本,组织学者讨论,并展开读者调查——在这个时代,你喜欢什么样的翻译?结果,许渊冲的“魂归离恨天”在投票中得了零票。

这些批评的声音让许渊冲很难平静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他形容这场学术争论是文学翻译路线斗争的大问题,反对者流毒至今,非要打倒了不可,批评对方不理解自己翻译时在粗活后加上非常艰苦的用意。此后,许渊冲提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,文学翻译是两种文化的竞赛,译者要发挥译语优势,战胜原文。这样的观点,自然也引来了不少反对声。

即便如此,许渊冲仍坚持自己的学术要求,每天依然“好上加好,精益求精;不到绝顶,永远不停。”他的这种坚持,也得到了回报。2014年他成为摘得“北极星”杰出文学奖的首位亚洲翻译家。《朗读者》节目组的感慨则更为动情,“这是一场文化的遇见,因为他,西方世界遇见了李白,杜甫,遇见了杜丽娘。”

2021年,许渊冲先生100岁了。借此文,衷心祝福老人家身体健康,宝刀不老,笔耕不辍,新译不断。

